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

..... 廖耀湘 杜建时(1)

孔祥熙与日本勾结活动的片断 贾存德(59)

记上海统一委员会 吴绍澍(70)

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 爱新觉罗·溥 仪(84)

土肥原策动“北洋派大同盟”的内幕 许念晖(130)

附注：

对《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一文的补充

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第四十三辑

我们所知道的

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

廖耀湘 杜建时

一 美蒋关系的起源

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采取隔岸观火，保持所谓静观沉默态度，并想压制中国抗战，指使蒋介石对日妥协。但是这时中国人民抗日的要求已使美国无法遏止，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南京、武汉以后，更加疯狂，美国乃采取让中日战争打下去，借日本扑灭中国的革命火焰；同样，借中国人民力量削弱日本，自己却装出一个严守中立的伪装面孔。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在亚洲大陆上遂行其南进政策，法国殖民军首先在越南向日军投降，英国殖民军统治的缅甸、马来亚、新加坡以及泰国、印度均将不保。柏林、东京、罗马轴心，大有会师伊朗之势。英国希望中国军队出兵缅甸，牵制日本侵略军于缅甸北部地区，以免日本侵略军由新加坡、仰光沿海经阿拉干直闯印度。

早在1941年1月间，国民党重庆政府应英国之邀，组织了一个印、缅、马军事考察团，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为军事代表团团长，侍从室主任林蔚为副团长，率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及陆海空军人员十余人赴印度、缅甸、马来亚进行军事考察，由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陪同前往。当时拟订了一个中英合作的防御计划，由国民党方面预备十个军的兵力随时开赴缅甸，策

应马来亚和印度。蒋介石希望保持仰光海口和滇缅公路的军事补给线，至是，乃派罗卓英、杜聿明率领第五军、第六军、六十六军进入缅甸援助英军，阻击日军。

此时，美国既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盟邦，即对蒋介石政府陆续给予军火物资的援助，先后给予财政贷款和中美租借协定共十三亿七千万美元；先派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来华，继派史迪威充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和蒋介石的参谋长，以指挥国民党军队及掌握有关作战的训练装备补给等问题。这是蒋介石派熊式辉和宋子文先后赴美国洽商谈妥的。美国的目的是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日，一方面是为它自己取得英法在东方殖民的统治地位。蒋介石这个大政客对美国则用不支持则拆伙的无赖手段，索取大量军火和金钱，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用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此，构成美蒋勾结复杂矛盾的关系。

二 史迪威与蒋介石关系的始末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和史迪威指挥驻印军打通滇缅公路的作战经过是这样的：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退入印度的经过概况

1942年春（3—5月），蒋军配合盟国作战，为了阻止日军攻占新加坡向缅甸急进直入印度的猛烈攻势，应英国的请求，组织了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当时远征军的编组，是以第五军杜聿明部和第六军甘丽初部为主干，由杜聿明以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的名义负指挥的责任。后来（约在4月中）才派罗卓英任司令长官的职务，并增派六十六军张轸部入缅，共为三个军。入缅作战的目的是想占领仰光，保持这个唯一的出海通路。但日军已抢先占领了仰光，远征军不得不在仰光的外围与日军作战。

当时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士气非常旺盛，在仁安羌把截断英

军退路的日军打退，把英军主力救出重围，在仰光外围同古接替了英军的阵地，尔后又担任后卫，掩护英军主力按计划安全撤往缅甸曼德勒地区。英军原定在那里集结，再会同中国军队发起大规模反攻，规复仰光。但英国军队并没有信守诺言，到达曼德勒立即迅速渡伊洛瓦底江向印度退却，置中国军队于死地而不顾。蒋介石才知道上了英国人的当，只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苦，从而迁怒于史迪威（因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资格，随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一同入缅，蒋介石并托史迪威特别关照中国入缅军队，要史担任英军统帅亚历山大与中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并指导作战），不过外表还是非常客气，并未见诸词色而已。

当英军由曼德勒地区撤入印度，中国入缅远征军主力第五军（三个师及直属部队与张轸军之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陷于三面包围之中，史迪威偕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及长官罗卓英，随英军退至伊洛瓦底江西岸，想沿江至密支那再退入中国境内。他们进至卡萨（密支那以南约三日行程）附近，史迪威得报，日军已进入八莫、密支那，长官部与所有军队退入中国的归路，已被截断。史迪威认为只有迅速跟上英国军队退入印度，再无他策。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接受了史迪威的意见，命令杜聿明并直接命令孙立人师立即跟随英军经路（实际是缅甸与印度东北角唯一简易汽车路，以北就是野人山原始森林，几乎是无人烟的区域），向印度英伐尔撤退。

按战术与地形而言，史与罗的决定本来是最合理的决策，但实际掌握部队实力的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不愿意退往印度，仍想绕密支那以北地区回国。据杜聿明说，日本人当时尚未进入密支那（但史迪威的情报正确得多，日军正向密支那急进中），所以他不服从史迪威与罗卓英的命令。史、罗当时陷入十分烦恼与危急的状态中。英军已退远了，中国部队长不听命令，远征军长官部当时一个警卫连都没有，只是孤零零的一个司令部。史迪威又得报（他当时与英军还通无线电报），日军已离开

他们的驻地卡萨不远，他急不暇择地即偕罗卓英与长官部的官员，丢了一切车辆（卡萨以西没有汽车路）、行李（他们没有骡马），自己背上一枝冲锋枪，徒步而行，饥疲交迫地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会合英军。史迪威在同古、斯瓦、巧克巴当、索吉等战役中与中国将领在指挥方针上意见分歧，因而认为中国高级部队长不听命令，促成他尔后对中国军队一些偏激的想法、看法和逾越常规的作法。他认为中国军队高级将领都不能信任，尤其厌恶杜聿明。所以后来杜聿明被迫退入印度时，他立即把杜聿明赶回中国。廖耀湘到印度边境时，史迪威的参谋长柏特诺上校来接廖，并对廖说，从现在起，你们是 Stiwel's boys（即史迪威的孩子们），不再与杜聿明有任何隶属关系，也不能再听他的话与任何命令。这时史迪威就开始产生一种新的打算，即掌握中国流入印度的这支部队，作为他个人英雄与冒险事业的政治资本，并把它变为变相的美国雇佣军。

杜聿明是实际指挥第一次入缅军队的高级将领，但他当时既不知英国的作战方针，又不知缅甸地理与特殊的气候，徒使中国军队作英军的替死鬼。在军队撤过伊洛瓦底江由江西岸向密支那撤退途中，又迟迟其行，考虑抢运英军丢下的大批军用物资。他命新二十二师在卡萨以南一个地区停留三天，致使日军先我至卡萨与密支那，使最后归路断绝。他不知道缅北与印缅间地形与季候大变化的情况，竟又自作主张，不听罗卓英与史迪威的命令，想经由野人山中、印、缅未定界区域退回中国，致令全军陷入死地（雨季中到处是水，羊肠小道大部淹没，又无粮食），使军队饿死、病死、溺死一大半。新二十二师九千余人，到印度只剩饥疲之众约三千人。他自己几乎因回归热死去。他的电台也丢了，又不能与中国和英军任何一方联络，真是危急已极。当时蒋介石十分惶急，托史迪威并通过他找英国人到处寻觅搜索。后来在缅北大洛地区，始由史迪威派来的飞机发现地面上一些寻觅粮食的士兵（因飞机飞得低，发现士兵军帽上有青天白日帽徽，飞机上人员不管

是与不是，就把给养药品，尔后又把无线电池、电台、信号等投下来)，才联络上，但士兵已死去二分之一以上。蒋介石接纳史迪威意见，命令杜聿明按飞机丢下的地图和路线退入印度。沿途由美机与中航机集中投粮，美国人与英国人派人至野人山与沿途经历的部落酋长接洽，为中国军队修桥开路，历时约三个月，才陆续到达印度极东北的一个角落，最后始脱离险境。

当杜聿明决定退野人山时，也命令新三十八师孙立人跟他退往野人山。但孙立人曾直接得到史迪威与罗卓英退印度的电报，他行至野人山附近，看到形势不对，便不再服从杜聿明的命令，自行改变道路，再回转去走英国军队退走的老路，赶在大雨未到之前到达印度。所以他那一师人员马匹、装备尚无损失，而且收容一部散兵与侨民，一同退入印度。史迪威和罗卓英得到这支部队，非常高兴。这时，史向英国人说话才有一点资本。因为那时英国急需军队守卫印度，哪怕一个连一个营都很好。这也是后来史迪威看重孙立人的开端。

孙立人到达印度和在野人山找到杜聿明的部队之后，史迪威就立即打算要掌握中国所有入印部队，把它变成美国变相的雇佣军，直接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首先把他最厌恶的杜聿明赶回中国。蒋介石与中国入缅高级将领甚至士兵，在缅甸受英军欺骗之后，都痛恨英军。但退入印度，又一次不能不寄英国人的篱下。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和一般官兵都认为美国人还是比英国人要好一点，虽然都是非我族类，所以又颯颜托史迪威照顾。流入印度的中国部队，后来统编为驻印军，以罗卓英为驻印军总指挥。由史迪威出面负责向英国人领取饷薪、人马补给，转交给中国驻印军部队，并由美国运武器，由中国内地空运新兵，重新整补，充实驻印军各部队。史迪威又从美国调来大批军官在兰姆伽成立训练机构，训练驻印军官兵。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史只居于中介联络地位，中国驻印军的指挥权与行政权，仍应由中国自己将领即罗卓英负实际责任。由英方领来薪饷粮秣被服等补给物资，应该

交罗卓英按中国军队法令习惯发给各部队。但史迪威在1942年春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之后，认为中国高级军官指挥无能又不服从命令，对杜聿明在最后紧急情况下不服从他退印度的命令尤为深恶。他对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及罗卓英不能严格掌握所属入缅部队，都深刻不满，认为这些都是1942年春缅甸战役失败因素（这些都是史尔后亲自对廖耀湘说的）。因之，他决心不要驻印军的中国高级将领和营以上的中级军官，只要尉级以下军官及士兵。史本人及一般美国军官都夸称中国下级军官及士兵能打仗、吃苦耐劳、服从和勇敢，但认为中国中级以上军官不行，甚至对廖耀湘当面都说这种极不礼貌的话。史既存有这种偏激思想又决心这样干，所以他首先发动驱逐罗卓英及其总指挥部的所有高级军官，以去掉驻印军的首脑，然后再分别宰割两个师，去掉两个师长及团营长，改由美国军官直接统率驻印军各个单位，好像当年英国军官直接统驭印度殖民地军队一样，把驻印军变成真正名符其实的美国雇佣军，用以作为他（史迪威）的政治资本。史迪威这些思想和行动（罗卓英、廖耀湘和孙立人等都曾把它报告过蒋介石），曾深深激怒了蒋介石（后来廖耀湘会见蒋介石时，蒋曾当廖之面大骂史迪威）。

史迪威企图直接控制驻印军与蒋介石对史的不满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蒋美之间的矛盾，从史迪威驱逐罗卓英事件起就开始加剧。驻印军当时是唯一流入外国的中国军队，是蒋介石所说的“孤儿”，部队虽少，但他十分注意。有问题就会闹到他那里，他也不得不亲自处理或过问。史迪威既决心驱逐罗卓英，首先就在蒋介石那里控告罗卓英与美国人“不合作”。当时“不合作”三个字在美国人心目里是一件大大的罪行。师里有好些中下级军官，只要是美方在备忘录中有“不合作”三个字，就要求调职甚至撤差送回国。至于在重庆、兰姆伽各地散布罗卓英指挥无能、没有统驭力、不知如何训练所属军队

去打日本人，更是毫无忌惮地公然进行。最后史迪威在重庆一次重要会议上竟公然攻击诋毁罗卓英（这些都是罗的参谋长杨业孔回重庆后写信告诉廖耀湘的；何应钦来印度兰姆伽时也曾同廖谈过），含沙射影地说罗卓英总是向他要钱要饷，他不知道究竟要这些钱并要求直接掌握这些粮饷干什么？意思是指罗卓英贪污吃缺。实际上史迪威已组织好补给与财务机构，企图掌握驻印军命脉，不愿把粮饷交给罗卓英，而要由美国人直接发给驻印军各团队（甚至不经师部）。当时与会者一时不明情况，为之哗然，甚至有人认为罗有辱“国体”。蒋介石即电召罗回重庆询问情况。罗卓英据实将史迪威要直接控制驻印军命脉，与直接掌握驻印军指挥和行政权力实际情况面报蒋介石。蒋介石内心十分抵触，但仍保持镇静，不愿因这些“小事”得罪史迪威，因而得罪美国。他表面上一团和气，顺应史迪威的愿望，立即把罗卓英免职，并把驻印军长官部大小官员空运回国。蒋任命史迪威兼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全权统驭驻印各部队，直接指挥驻印军的两个师（尔后陆续增至三个师，最后增至两个军五个师）。

罗卓英被调回国之后，史迪威并没有放弃他那“只要兵不要官”的想法和作法，改用变相的方法以美国军官替代中国驻印军的师、团、营的军官。他在驻印军中委派师、团、营三级的美国联络官。各级联络官各有佐理人员及电台，形成师、团、营的指挥部。在兰姆伽整训时，举凡经理、补给、装备、训练、指挥等等，史迪威都经由联络官这一系统直接命令部队行动（中国军官通常也得到命令的副本）。有时，史迪威将军队调动之后，中国军官才知道，甚至不知道。一次，史迪威将新三十八师的师直属部队调走之后，师部才知道。当时驻印军的两个师长，最后只保存一点点人事权限，保存一点点主权象征。驻印军中的中国军官，凡与美国人不和者，即以“不合作”的罪名撤职空运回国，引起驻印军官兵强烈的民族感情，上下非常愤慨。廖耀湘、孙立人等把这种不能容忍的状况，直接电报蒋介石，并准备必要时率军经由西

藏回国，不甘愿这样寄人篱下，受人侮辱。蒋介石的内心对这些事非常抵触，甚至恼怒（尔后蒋介石亲自当廖耀湘之面骂史迪威为“帝国主义者”，把我们当北洋军阀对待。史迪威一贯看不起蒋介石，在史的日记里和同他亲信谈话时，经常称蒋为“蠢宝”），回电要他们忍辱负重，不能乱动，应虚与委蛇。蒋非常注意驻印军情况，当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从重庆飞印度兰姆伽驻印军营地抚慰驻印军官兵，并对廖耀湘和孙立人（当时只有廖、孙两个师及几个重炮团）传达蒋介石意旨。主要仍然是忍辱负重、虚与委蛇，先领取武器装备，并利用美国训练机构把官兵都训练好，团结自己官兵，自己内部暗中保持整然系统，凡部队长与美国人有摩擦者，暂时调换职务……总之只要把武器装备拿到手，美国人最后总不能把我们的部队带走等等。廖耀湘和孙立人当时把史迪威及柏特诺等种种违反国际常态的作法，一一告诉何应钦并转呈蒋介石。也提到1942年史迪威与英国人利用中国军队作替死鬼，最后将其置之死地的情况，尔后应特别当心，不要再蹈前辙。必要时，我们要靠自己（因日本当时有随时打印度的可能，以策应德国法西斯在苏联的攻势），准备好由西藏退回国内。何应钦说：1942年入缅战争和悲惨结果，委员长都知道，现在情况委员长也深刻知道和深深挂念，委员长与史迪威也是虚与委蛇。

接着何应钦谈到史迪威要直接掌握运入国内的武器装备，不愿交给军政部统筹支配，甚至要由他挑选部队加以装备，由他训练、补给、指挥。何当时提到史还要直接装备云南卢汉等人的部队，蒋介石和他本人都非常伤脑筋，都不能不虚与委蛇，因蒋介石不愿因史迪威一人而开罪美国。所以何当时结论式地说：“你们更应体贴委员长苦心，忍辱负重，千万不能出乱子，影响大局。”何应钦回国把驻印军当时情况和官兵感情转告蒋介石。蒋介石为避免廖耀湘、孙立人与史迪威及其参谋长柏特诺等直接多所摩擦，引起最后决裂，他又送去一个性情最温和的郑洞国来到兰姆伽当新一军军长，把当时驻印军仅有的两个师（尔后再运来一个师）编

为一个军，隶属于驻印军总指挥部。一方面实行何应钦说的自己暗中保持整然的体系，另一方面使郑洞国居间缓和各师长与史迪威及柏特诺之间的直接摩擦。最后蒋介石还派他的儿子蒋纬国到驻印军任职，也意在联络美国人，居间协调感情。但是这种迭床架屋的指挥体系，曾引起史迪威的抵触，他根本不许郑洞国过问指挥、行政与补给等事，把他闲散丢在一边。郑只能作为当时驻印军精神领导的象征而已。

史迪威违反蒋介石的意图指挥驻印军孤军深入缅北

1943年下半年，史迪威本人即倾全力计划准备调动军队回师缅甸，纵然英国军队不动，他决心指挥中国驻印军三个师单独打入缅北。云南怒江两岸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卫立煌指挥），则渡怒江与驻印军会师，以打通中印公路。当时蒋介石与史迪威等都迭次请求英国尽速反攻缅甸，但英国一再欺骗中国，口头答应得很好，但按兵不动（当时蒙巴顿勋爵任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曾到重庆，预允尽速反攻缅甸，但就是按兵不动）。史迪威不管蒙巴顿如何行动，他都要倾全力以赴。1943年冬，他亲自指挥中国驻印军部队与一部美军（一个步兵旅及一个工兵团与庞大的后勤部队），第二次翻过印缅边境的野人山进入胡康平原（即伊洛瓦底江一个重要上源），与日本十八师团前哨部队和前进据点实行广正面的接触。

由于史迪威使用美国联络官控制驻印军的阴毒办法，引起中国官兵的极大反感，既达不到统驭的目的，更不利于指挥作战。1943年冬，新三十八师在回师缅北的初期各个战役中，都遭受严重的挫折。例如美国联络官指挥新三十八师的一个营作战，在大洛前线受挫，三个月没有一寸的进展。1944年1月上旬，新二十二师超越新三十八师进出大洛、猛关一带，该师师长廖耀湘命令所属之六十五团团长傅仲良不依照史迪威及联络官的作战计划，而改向大洛进军，全歼大洛日本十八师团的一个加强营，揭开打

回缅甸胜利之端。史迪威因六十五团团长不听他的命令，将他撤职并准备遣送回国，改以美国军官加伦上校接任六十五团团长。廖耀湘以傅仲良打了胜仗，同时认为美国军官来当团长是干涉师内主权和行政，乃坚决拒绝，并报告蒋介石。蒋复电认为处置得当。这一事件引起新二十二师全体官兵与美国人之间的大摩擦。美国在新二十二师的联络官史密斯上校、六十五团联络官菲西中校与史迪威总部的部分人员以及其他多数美国联络官，亦都认为史迪威在这一事件上处置失当。廖耀湘以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更坚持不让步。当时部队已进入战地，正处于作战紧张期间，师内大多数的美国联络官认为不能如此僵持下去，这对作战及中美关系都不利。史迪威最后被迫收回成命，恢复傅仲良六十五团团长职务。这是史迪威在驻印军中横行霸道第一次受到的最不体面的打击。在这以后，史迪威才停止直接干涉新二十二师的行政。美国联络官则主要负责补给，帮助策划作战，代史迪威检查作战任务之执行。

蒋介石热望与英国蒙巴顿所指挥的东南亚盟军主力(英国)共同反攻缅甸，但不主张驻印军孤军冒险入缅，重蹈1942年第一次入缅失败的覆辙。1943年12月初旬，蒋介石在参加开罗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路经印度时，停下来找廖耀湘、孙立人和史迪威面询情况，并讨论反攻缅甸的军事问题(当时驻印军三个师只有廖、孙两师训练完成，并正在陆续向印度东北部集中)。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归途虽很高兴，心情舒畅，但他始终未得到蒙巴顿即以主力支援驻印军反攻缅甸的确切诺言。因此，他主张暂保留原态势，不宜孤军深入密支那地区。蒋介石亲自拿地图当面指示廖、孙与史迪威(由宋美龄翻译，无他人参加)，最前线暂停止于当时的到达线(猛关西北伊洛瓦底江北源即清德温 Chindwin 江上的一条支流，在新平洋以东约二十公里)，以等待英国军队主力的行动。

不到一个月，即1944年1月初旬，史迪威即违背蒋介石当面亲授的机宜，认为当面之敌，只日本十八师团，又没空军掩护(当

时美国十三航空队已集中于该方面直接支援驻印军，故已能绝对制空，并形成压倒优势），而当时十八师团火力稍逊于驻印军的廖、孙两师，加上美国一个步兵旅与后续可能调用之新三十师，认为占绝对优势，可以一举进出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因而立刻发动大规模行动，首先攻破猛关，击破十八师团的主力，前锋利用空投补给，不顾后方交通，直薄密支那地区。

当时廖耀湘、孙立人一方面打电报报告蒋介石，一方面仍遵照史迪威的命令行动。蒋介石对史迪威拿中国军队冒险孤注一掷的办法是不满意的。他打电报给廖、孙等方面服从命令，同时应小心谨慎；又电史迪威要他注意与盟军协同行动，并婉劝他不要冒险深入。史顾虑廖、孙随时可能直接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行动，使他感到不安。史在猛关前线曾单独找廖耀湘谈话，不用翻译，直接用英文和法文交谈。史首先对廖说，他现在处于很为难的地位，虽然打了胜仗，但重庆反对他的意见和作战方案。他问廖：“你是不是接到蒋委员长的直接命令？”随即又说：“上次缅甸作战（指1942年入缅战役），我确知他直接发令指挥下面的部队，结果之惨，你是知道的。如果他这次仍然是那样做法，那你我都可能功败垂成。为了共同事业的胜利，迅速地打通这条通往中国之路，我希望你要支持我的断然打通这条路的作战计划。”他又说：“我俩都是正直的军人，不是政客，应该以军人的态度和思想方法考虑当前的敌情和任务，并根据以作决心处置。”

在猛关战役以后，廖耀湘对史迪威有了良好的印象，并被他的激昂的态度所感动。当时廖并不掩饰和蒋介石直接有电报往还，但对史表示，只要对共同的事业有益处，只要确有把握打通中印公路，而又不使军队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决定支持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忠诚地执行他的命令。史迪威表示很高兴，并分析了当前敌情与怒江方面的敌情。蒙巴顿在猛关胜利后，曾亲自到猛关前线视察，已部分出动英军（一个师，尔后在猛拱与驻印军协同作战），直接支援驻印军，并准备继续增加。史迪威向廖耀湘保证绝

对的制空权，无论山顶水涯，他完全保证人马粮秣械弹的空投，根本不依赖地上交通，更不必有后顾之忧，并保证永远不会发生1942年第一次入缅那样可耻的情况。因此，消失了廖耀湘和他部下的顾虑，准备一往直前地打下去。当时廖把史迪威的企图和信心直接电报蒋介石，主张暂时放手让他干去，并建议蒋利用英国粮饷、营房、教练设备和美国的武器与技术训练，再空运二三个军在印度就地训练装备，随中印公路之打通，携带大批武器、装备、车辆回国。蒋这次赞成进军缅北，不再坚持原地停止以待英军出动的意见，但未答应即增加兵力。史迪威对廖耀湘积极支持他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计划及从旁对蒋进言，以减少这方面的阻力，表示感谢，减低了过去的摩擦抵触，不再干涉廖师的内部事务，并保升廖为新编组的新六军军长。

但是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驻印军主力深入缅北到达密支那与猛拱外围地区的同时，日本缅甸方面军总部为截断驻印军前线部队后方补给联络与扰乱整个印度打击英军，集中了五个师以上的兵力，沿1942年英军由缅甸退却的那条公路及两侧地点，直接进攻印度东北军事重镇英伐尔。英伐尔以北九十公里，就是加尔各答至里多空运基地的铁路干线，而且距里多空运基地（驻印军前线各部与对昆明内运武器弹药的大基地与仓库集结地）不远。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举即攻至英伐尔城郊，不仅震动驻印军，而且震动全印。所谓东南亚盟军统帅蒙巴顿更是慌作一团，集中英国驻东南亚全部空军、全部装甲车队（当时整个英伐尔圆周上是一道用战车构成的铁墙），抽调来了几乎可以抽调的步兵师（约二十个师），最后还把驻印军新成立的新三十师最后一个步兵团都拉上去充预备队，才把日本人阻住，然后才稳定下来成胶着状态。日本军队久攻（约三星期）不下，最后还是因天雨道路泥泞，又无法制空，被迫撤退。英军惨胜，连跟踪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日本人走远了，才慢慢地像老牛一样逐次向缅甸推进。

当日军进攻印度东北部英伐尔时，进入缅北的中国驻印军官兵都感动摇，因为这是对缅北驻印军第一线主力的一个致命的威胁。如果攻击成功，则入缅军的空运基地和通加尔各答的铁路线，都将一齐被截断。廖耀湘甚至打算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日本进占印度），由印度东北部之沙地耶翻喜马拉雅山向西康之巴塘、里塘退回中国（廖曾在一个英国种植茶园的大庄园主那里看到一份详细地图，知道那里有一条羊肠小径可通，甚至可走骡马，只约一星期行程，没有人烟）。日本前线军队也宣传要把入印中国军队第二次困死在野人山。蒋介石这时也有一点沉不住气，要求停止向密支那前进，要求确保退路安全，不能再一交使中国军队困逼野人山中。史迪威比较明了全盘状况，认为更要加速向密支那、猛拱前进，再一次找廖耀湘谈话，稳定军心。他说：“蒋深受日本人进攻英伐尔的影响，只怕退路被截断，这是没出息的想法，眼睛不能总是看后面。蒋以为日本人集中力量进攻英伐尔，对我们的后路将造成莫大的危险。我则认为日本人这场进攻，给我们带来莫大的好处。首先，这压迫印度的英国人，不能不拚全力与日本人作战，迫使英国军队不能不与我们一同打回缅甸去。其次，日本在缅甸的主力打击方向没有指向驻印军，使我们避开了这一猛烈的冲击，这对我们是一件大好事。现在已不是1942年日本直下新加坡、缅甸的时候了。印度的英国人已获得了喘息与准备的机会，他们这一次决心保护印度，首先决心在英伐尔站住脚。他们空军占压倒优势，有那样多的战车、重炮与步兵师，后方交通又如此便利。日本人仅靠一条急造的军用公路，又不能从空中补给第一线的兵团（这一点史迪威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尔后的事实证实了）。现在英国人已在英伐尔城郊站稳住脚，在英国这样火力杀伤之下，日本人纵然攻击精神旺盛，也不能经受较长时日的消耗。”他认为驻印军正应乘日本人进攻英伐尔的机会，不能调集强大的预备队向我们反攻的机会，我们应乘虚直捣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史迪威调新三十师之一个团及美军的一个混成团，由丛山峻岭热带森

林中的羊肠小道，用重金雇用土民带路，秘密行军约二星期，完全靠空投补给，出乎日军意料之外地接近密支那地区，并一举占领密支那飞机场，立即以大批飞机大胆地空运新三十师主力在密支那机场，冒敌炮火着陆。随后利用日本人在雨季不易增援密支那的时机，经约一个月反复强力攻击，打下缅北日本人最重要的战略要点。当即与由怒江东岸进至腾冲的远征军五十四军方天部会师，迫使日军由整个战线撤退。

史迪威对日军攻英伐尔不能成功的判断，与乘日军攻英伐尔之际，利用缅北日军之空虚薄弱的机会，孤军深入密支那，最后打通中印公路的计划成功了。在日本被迫由英伐尔退却之后，蒋介石也认为中印公路打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这时也同意增加驻印军的部队，特由云南空运五十四军两个师即十四与五十师在印度东北部着陆，在战场直后方装备训练，于1944年9月初扩编为两个军，即新一军与新六军。新一军辖新三十八师与新三十师，以孙立人充军长；新六军辖新二十二师、十四师与五十师，以廖耀湘充军长。

美蒋关于装备中国军队问题，尤以装备八路军问题，发生矛盾和破裂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装备中国军队的问题上美蒋的主要矛盾

史迪威想利用装备问题，抓住大量中国军队，把它变为变相的美国雇佣军，即：由国民党出人，美国人给予装备，一切行政指挥，由美国独揽，不容蒋介石过问。这说明美国无视中国的主权，体现为史迪威的野心勃勃。

当驻印军进攻缅北的时候，史迪威曾对廖耀湘说，他早已建议蒋介石多运一两个军进印度，装备训练，但蒋介石不愿意，好不容易才说服他把一个破烂的补训处空运来印度编为新三十师。史又说，蒋介石以为把军队送到印度，似乎就失掉了它的样子，宁愿把这些部队放在云贵山区，吃不饱、穿不暖，拿几根旧步枪，一

点战斗力都没有。这里有武器装备，因空运力有限，运不出去（即运不进中国内地），有枪没人捐。由昆明回印度基地的运输机，大都是空机返航，没有货物可运，可以大量运兵。他希望廖耀湘从旁建议蒋介石增派军队来。又根据一些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很有力量的队伍，能同日本人打，只是缺少武器。史迪威当时正是代表了美国人这一思想，并不把中国共产党军队排斥在抗战之外。当时史迪威曾坚持要装备共产党的军队，同时也准备装备地方部队，如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余汉谋、卢汉等部队，以牵制蒋介石。而所有装备部队，都要由其选调。这虽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但还可以容忍下来，唯独在装备共产党军队的问题上，最后非导致决裂不可。

据汤尧的材料，1944年7月，史迪威曾给军委会后方勤务部一份备忘录，质问该部补给单位为什么独独没有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同属中国抗日部队，应给以同样的补给，以增加战斗力量。该部各业务部遂据以拟定对十八集团军的补给计划，并在计划上附一发给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的电稿，请派定兵站分监和表报人马武器种类数量和兵站线路，以便经常补给。这一稿案由汤尧以该部参谋长身份提请部长俞飞鹏判行。可是当俞看到这一草案时，就大骂糊涂不止。他一面电话召集各业务处长来开会，一面用墨笔将草案画一对角线的×字，甩到办公室门外地上，口中恨恨不绝。等到各处长到后，俞指着地下草案问：“谁叫你们这样计划的？不是关照过你们不要补给奸军吗？”参谋处中将处长冯环说是史迪威建议的。俞大怒说：“你们听委员长的还是听史迪威的？真是岂有此理！中国人就是喜欢听外国人的话，天生亡国奴相。下次再要这样糊涂，就报告委员长，以勾结奸匪论罪。”

到了1944年8月桂林柳州会战前夕，汤尧随参谋副总长白崇禧到柳州指挥第四战区张发奎部作战。有一天晚饭后二人同到立鱼峰后面散步，看见美国空军返航，汤说：“幸亏他们来了，不然像桂柳今天的情况，敌机还是天天光顾，我们连散步也不可能了。”